

张家驹宋史人物传记

赵匡胤

传

张家驹◎著

千古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宋太祖传记的开山之作

改革是大宋最大的红利，赵匡胤悄无声息，
掌舵渐进式改革

登基·削兵·集权，帝国政治可以没有硝烟。且看军
人皇帝，如何铸就文治江山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张家驹宋史人物传记

赵匡胤

传

张家驹◎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匡胤传 / 张家驹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068-4589-2

I. ①赵… II. ①张… III. ①赵匡胤(927~976)
—传记 IV. ①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1095号

赵匡胤传

张家驹 著

策划编辑 刘 路

责任编辑 刘 路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55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589-2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张家驹宋史人物传记》前言

今年是张家驹先生的百年诞辰，距他去世也恰四十周年。作为 20 世纪宋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其生平为世所知者大有“零落成泥”之憾。关于他的传记，主要有李小松的《青山隐隐水迢迢——记宋史学家张家驹》（收入《广州文史资料》1988 年第 39 期），程应镠的《一位为人师表的学者——张家驹同志逝世十周年》，李培栋的《宋史学家张家驹传》（以上二文均收入《张家驹史学文存》）。我写过两篇关于他的文章，一是《一部几乎被遗忘的拓荒之作——张家驹与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即《文存》前言的主体部分），一是《尚余春梦足清谈——写在〈张家驹史学文存〉之外》（收入拙著《敬畏历史》），在钩沉其学术行迹的同时，还试图对其史学成就作出评价。这里，没有必要再缕述他的生平，仅随事而发地说点感想。

张家驹的本科毕业论文题为《宋代东南之繁盛》，其日后“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早已珠胎暗结在其中，学术水准远在今日一般史学硕士论文之上，足以表明其宋史研究的起点之高与廊庑之大。他从燕京大学走出，曾师从洪业、邓之诚、张星烺等名家，也听过顾颉刚与谭其骧的历史地理课，与周一良是同届同学，与侯仁之、王钟翰、程应镠为前后届系友，与国文系的陈梦家是燕大文学院的同届生。近年以来，对民国学术的评价莫衷一是，有人推崇备至，有人认定高估。且不说追念民国学术，其风向所指是当下学术生态之腐败；像燕京大学在短短数年竟造就了卓尔不凡的学者群，显然是不能低估，值得探究的。

通观张家驹的学术生涯，李培栋认为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期，延续到 1942 年；第二个高峰在上海师范学院的 1956 年到 1962 年。”第一高峰期大体跨度十年，代表作为《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这一时期约有过半岁月处于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第二高峰期只有短短

六七年，代表作为《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据李培栋说，“1962年后政治形势日益严峻，已很难进行研究工作了”。这一回顾，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倘若说，他的第一高峰期因外敌压境而被迫中断，那么，他的第二高峰期却纯然因内乱孔棘而彻底夭折。他是1974年辞世的，1962年四十八岁，即便寿数命定，其后12年正是学术研究的鼎盛期，理应有更多成果传之后世。但这12年中，他唯一发表的却是1965年岁末《文汇报》上那篇为配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钓鱼”的文章《论海瑞的评价不宜过高》，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

张家驹享年六十，无论怎么说，都走得太早。这应与他的“文革”遭遇有关。“文革”开始不久，他的独子就在广东受迫害而死，据程应镠先生回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即便好友，他也“从没有对人诉说过这摇撼了他肉体和精神支柱的悲哀”。这一期间，他本人也被打为“牛鬼蛇神”，在学校附近接受“劳动改造”。据李培栋说，“张家驹家在虹口，每天必须六时出门，才能赶上七点半的早请罪点名，晚上八点半放人，他回家约已十点钟，睡眠不会充足，他又是老胃病，中午只吃自己带来的一小热水瓶的面条，这样的生活，对于他来说，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张家驹刚满六十岁而病死，实际是和遭受这段摧残大有关系的”。我有时在想，倘若没有“文革”，1968年我应届考入上海师范学院（即今上海师范大学前身）就读历史的话，也许会向他学宋史；倘若没有“文革”，他没受摧残而病死，完全可以延长十几二十年的学术生命，为宋史学界做出更多的贡献。历史虽没有“倘若”，后人却应该警醒。

在学术史上，“名师出高弟”与“高弟出名师”的现象，都不乏其例。张家驹蹉跎居上海师院这样的三流大学，未有弟子能传其学，便绝无可能享受“高弟出名师”的表彰，这无形中导致其学术成就被低估。我之所以在五年前发心编集《张家驹史学文存》，就试图客观还原他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与影响：

倘若借用西方科学哲学中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这一中国史研究中的“范式”是由张家驹创立的，其后的研究都是对这一范

式的补充与展开。张家驹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与宋史研究中的开创性地位也由此而不可撼动。

即便就其传世论著而言，他已经无愧为宋史学创立期的主要拓荒者之一，他的“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说”，足以并称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里最具问题意识的两大命题，这样的贡献不可谓不大。（《文存》前言）

我与他并无师承关系，自信这样的评价决非阿私之言，而是建基于学术史轨辙的平允之论。

完成了《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后，张家驹的关注重心转向人物研究。1958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赵匡胤》；次年，他的《赵匡胤传》即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通过比照，可以推断，《论赵匡胤》是其整个赵匡胤研究的精华版，《赵匡胤传》则是这一研究的终结版。这册传记在剖析宋太祖立国规制优劣成败的两重性上，称得上辩证透彻而见解独到。其后三年，张家驹对沈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胡道静的《梦溪笔谈》研究珠联璧合，相互辉映，分别从人物与著述入手，共同奠定了沈括与《梦溪笔谈》研究的坚实根基。张家驹选择开国定制的赵匡胤与科技巨人沈括作为研究对象，其眼光识见毋庸置疑。其后尽管有多种赵匡胤与沈括的传记著作问世，但他的《赵匡胤传》与《沈括》却是全面论述这两位宋史人物的首部学术性传记。

当年因经费与篇幅所限，没能把这两部宋人传记全文收入《张家驹史学文存》，这是深以为憾的。今春中国书籍出版社联系到我，希望再版他的《赵匡胤传》。我提议，能否连同《沈括》一并再版，作为对这位宋史名家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终获大力支持。至此，在短短五年里，他的遗著已全部结集或再版，这是差可告慰先贤的。

这次新版，出版社对两册传记统一编辑处理，包括改正旧版的误植错排，古今地名按当前政区重新标注，补配了图像资料与文字说明。《赵匡胤传》作于五十五年前，这次是首次改版，我在校读时改动了少数史料的句读，斟酌了个别史实的表述，也适当弱化了成书年代那些强调阶级斗争的烙印（这既不必为贤者讳，我也尽可能少改或不改，相信读者自能理解与识断）。《沈

括》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已经再版，也就不存在这类问题。

1978 年一个秋夜，程应镠先生校毕亡友遗著《沈括》的清样，曾为一绝句，前两句云：“呕心剩有遗书在，忆往难禁泪满腮。”那年，我读大一，宋史学习还刚起步。不料三十六年后竟也为其校读另一遗著《赵匡胤传》，继业师之后与张家驹先生再续宋史缘。我于他没有亲炙之幸，自然少了那种“忆往难禁”的情分，但“呕心剩有遗书在”的感慨还是有的。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就像一次永无终点的远行，先行者的足迹永远是后来者不断前行的起点，不论后来者走出多远，也始终应对先行者深怀一份敬意。学术史的长河也遵循着大浪淘沙的铁律，轻飘飘的泡沫总要消退，沉甸甸的成果终将留下，学者的价值就在于他的遗书能够长久地传世。

虞云国

2014 年岁杪

序 言

赵匡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史家在论及封建皇帝时，往往把唐宗、宋祖并称。事实上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我们对他应当作出应有的评价和介绍。

近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对赵匡胤这个人物的评价，有着许多不同的见解。主要的分歧点有：赵匡胤在当时的活动，主要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还是阻滞作用的问题；赵匡胤的统一战略计划，应该是先向北进还是先向南进的问题；赵匡胤的集权专制政策，是积极还是消极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在北宋建立之初，摆在最高统治集团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首先是社会经济还是强化中央集权的问题。即使在肯定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在具体细节方面，也还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所有这些争论是完全容许的，这和党对科学工作所提出来的百家争鸣方针，精神上是悉相符合的；因为只有在学术上各抒己见，才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这本小册子的初稿，是在 1957 年写成的。解放以后方从头学起的我，与其说是企图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毋宁说是我读了一些史学先进者文章所得到的启发，以及近年来对这个问题进行独立思考中的一点心得体会。在写作过程中，终于因为自己政治及学识水平的限制，感到有许多困难，没有能够很好解决。

首先碰到的，是自己的理论知识很肤浅，对问题的分析不够全面和深刻。主观上尽管企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因旧的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史观，在自己的脑子里还有残余，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很浅薄，理解得也很不透彻，这就使我对于一个人物的看法，不可能完全正确，更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本来面貌。像对赵匡胤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主观上认为必须采取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既要肯定其具有进步意义的一面，也要批判其反动落后的一面；既要离不开当时社会阶

级关系和历史条件而孤立地看问题，又要指出其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使他造成的错误；既要正确地阐明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又要充分估计到历史人物所起的促进或延缓的作用。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往往出现搜索枯肠，捉襟见肘的状态。这样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就不免会有片面夸大，或者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

其次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史料，真可说是浩如烟海一般；而详细占有材料，又是评论历史人物的工作基础。以宋代为例，光是所谓“正史”就有四百九十六卷，一部“会要”的辑稿就有二百册。此外还有文集数百部，笔记小说数百种，和若干其他有关著作。不但史料丰富，材料杂乱，要通读一遍极感困难；而且无论是史官纂修的和私家记载的，同样地都杂有阶级偏见，甚至有私人恩怨的成分。有些事实出于道听途说，往往矛盾重重，说法既多，难得确证。有关赵匡胤生活部分，尤其如此。因此在写作时虽多方面搜集，仍然感到未能遍览周详。有些问题，只能大胆妄作判断。这样一来，就必然会出现材料抉择不精、有堆砌罗列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会发生判断错误、挂一漏万的毛病。这些矛盾的解决，就只有依靠读者们勇于揭发批判，使我能提高认识，得以弥补缺点和纠正错误。

文字方面，虽力求浅显易读，但既恐说得不够具体，又恐自己限于文学素养，译文会走失原意，所以在许多地方，仍然引用了原文。这样，可能会使读者看了觉得别扭，或增加一些困难。但对帮助读者研究史料这点上，也许会有好处的。

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历史学上一个重要问题。要给历史人物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作者无论在理论修养和写作水平方面都不足以语此。因此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不过是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以及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的一种大胆尝试，里面的看法很不成熟，错误势所难免，希望读者及研究史学的同志们多多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参考了聂崇岐、邓广铭、程溯洛、季子涯、史苏苑诸先生的大作，也采用了他们部分的论点。出版时又蒙董石声先生协助摹绘赵匡胤像，应当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59年3月28日

于上海师范学院

目 录 | Contents



79	77	63	53	46	37	33	30	27	23	21	16	6	3	1	1	1
『杯酒释兵权』	第四章 军事集权制度的建立	统一的历史条件	统一岭南	远征太原	合并荆湖	第三章 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	匡胤制胜原因	打垮李重进	歼灭李筠	第二章 击溃后周残余的反抗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漫游无所欲	匡胤的出身与成长	第一章 从出生到夺取帝位	序 言	《张家驹宋史人物传记》前言



145 136 134 131 126 122 119 115 113 111 108 105 101 99 95 91 83

军事机构的调整

『强干弱枝』政策

『养兵』政策和武器制造

第五章 『稍夺其权』与『制其钱谷』

收回地方行政权

改革中央官僚机构

集中财权

集中司法权

第六章 加强专制整顿内部

巡缉与窥伺

防范和禁约

对反抗者的武装镇压

思想文化的统治

减轻刑罚

惩治贪污

选用人才

第七章 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225 223 217 213 211 203 199 195 193 189 175 173 166 161 155 152 147

整顿税制

减轻徭役

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

兴修水利

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第八章 对外关系的发展

宋初边防上的守势

国防力量的巩固

第九章 匡胤生活作风和他的死

提倡节俭

向历代封建统治者学习

对降王的宽大

第十章 赵匡胤的评价

统一集权国家的重建

内政和经济的改革

对外政策的评价

匡胤在历史上的作用

壹

从出生到夺取帝位





匡胤的出身与成长

唐朝后期黑暗腐朽的统治，自从经过王仙芝、黄巢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公元907年，在藩镇割据混战中宣告结束。农民起义军叛徒朱温，杀死唐昭宣帝李祝，建立后梁皇朝。一时在唐末动乱中乘机招募散兵溃卒，或是组织“土团”“乡兵”，借屠杀劫掠起家的亡唐将领、地方官吏以及豪强地主，纷纷起来各占一方，称王称帝。前后二十多年的武装冲突，把一个名义上统一实际已经支离破碎的祖国山河，变成十多个大小不等割据独立的封建王国。

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正是叱咤风云、英雄角逐的时代。是谁拥有最坚强的实力，谁就有可能发展他的野心，达到统治人民的欲望。正如刘守光所说：“我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安重荣也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①为着满足统治人民的野心，兄弟砍杀，父子反目，权臣篡夺，军校拥立，种种丑态，在政治舞台上，一幕幕相继搬演，分裂的五十多年间，没有间断，翻开历史，尽是一些战场厮杀的记录。

离开梁亡后的第四年，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唐帝位，改元天成。天成二年的二月十六日^②，洛阳夹马营赵府中，诞生下一个婴儿，生得方面大耳，眉清目秀，取名匡胤。家主赵弘殷祖籍涿州（今河北涿县^③），官居飞捷指挥使。夫人杜氏，先前生育过一男一女，不幸都夭折了，匡胤就是这家主人第二个儿子。赵家原是“累代仕宦”，匡胤祖父当年做过营、蓟、涿等州刺史。弘殷是个武弁出身，自小秉性骁勇，擅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纪》，《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安重荣传》。

② 公元927年3月21日。

③ 河北涿县，现为河北省涿州市。——编者注



长射击。五代初年，投赵王王镕麾下，遇着梁、晋两国交锋，他奉了王镕之命，将五百骑赴援晋军，晋王赏识他的英勇，把他留下带领禁兵。及后晋王夺取了后梁帝位，弘殷一直在那里当官，举家住在洛阳。



唐庄宗李存勖（885—926），后唐的建立者，即将赵弘殷留在禁军的那位“晋王”。他打造了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最大版图，但治国无能，死于兵变。同光四年（926年），其父的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唐明宗。李嗣源励精图治，国家小康。他曾认为自己能力有限，又是沙陀族人，因此祈求上天早日降下一位圣人来拯救苍生。巧的是，天成二年（927年），赵匡胤应运而生。

天成以来，李嗣源为着增加税收和稳定政权，实行“休兵息民”的政策。减轻剥削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出现暂时的“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的局面。^①匡胤就在这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中，逐渐长大起来。根据地主阶级家庭的习惯，孩子大了，就该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学到一套统治人民的本领，大来好成就一番“功名事业”。弘殷也不例外，替他的儿子找了一位业师，此人姓辛名文悦，是一个同乡先辈，也是一个饱学的宿儒，匡胤随他讲习五经，原是最合适不过的。只是孩子们受到时代的熏陶，耳濡目染，又都是干戈扰攘的现实。尤其是出身在官僚家庭的赵匡胤，父亲是现任的禁卫军官，事实给他的教育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武力决定一切，要想骑在人民的头上，干脆放弃迂腐的封建道德教条，拿起枪赶来逐鹿战场，这才是登龙的捷径。匡胤在塾里念的是经书，放了学常和孩子们一道，做操演打仗的游戏，每逢从学塾还家，总要排起一列小孩子的队伍，自己押在队后，像真的有回事似的，行人遇见了，

①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纪》论。



也只好给他们让路。^①

朝代改易后，弘殷还是做着原官，不过随着后晋迁都，他们全家已经迁往汴梁。匡胤是在洛阳生长的，离开时至少已经十二岁，^②对这个地方具有深厚的感情。一直到他临死的那年，还亲到洛阳走了一遭，徘徊故居，不忍遽去。从少年期进入青年期的赵匡胤，逐渐长大成人，一副经常涨得紫红的大脸，魁梧的身躯，愈长得雄伟英俊、稳重深沉了。乱离的岁月，使他明确地抉择了自己的前程，决心弃文习武，转移读书的兴趣，集中精力来学习军事知识。恃着几分聪明，成绩看来倒也不坏，无论骑术弓箭，都锻炼成较好基础。有次他试骑一匹恶马，马上没有使用缰绦衔勒，当他骑上马背，正想鞭策前进的时候，那马忽然直奔上城的斜道，匡胤前额碰在城楼门楣上，翻身滚落尘埃。旁观的人们，都吓了一跳，以为匡胤的头颅会被砸碎。但等不到一会儿，却见匡胤慢慢地站立起来，一溜烟似的赶上那匹正在狂奔的恶马，耸身一跃，然后又骑到马上，幸亏没有受到损伤。^③

① 王偁《东都事略》卷一《太祖纪》。

② 后晋迁都在天福三年（公元938年），这时赵匡胤年十二岁。

③ 《宋史》卷一《太祖纪》。



漫游无所欲

十八岁那年，弘殷为他聘娶贺景思将军的女儿作妻室，可是在政治上，他迄未能打开一条出路。这几年赵家的生活，又是在动乱中度过的。这次的骚乱，来自遥远的边疆：当初后晋皇朝创建者石敬瑭，为了夺取统治权力，哀求契丹贵族出兵相助；他出卖了幽云十六州的领土和人民，宁愿向契丹统治者称儿称臣，给人民带来莫大的耻辱。而契丹的统治集团，久已垂涎中原的富庶，有随时入侵的意图。只因石敬瑭统治时代，对契丹统治者始终卑躬屈节，使他们找不到什么借口。等到敬瑭一死，继承帝位的石重贵，不肯向契丹称臣，意图改变过去屈辱的情况，这样，契丹侵略者便以此为可乘之机，大兴其“问罪之师”。当时黄河流域的人民，也曾和官军配合，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有一次，契丹国主就是在败军中夺取一匹骆驼，只身逃回本国的。可惜后晋朝廷中，内有主和的奸臣把持政柄；外有野心勃勃的将领，想以靠拢敌国势力，来换取个人的“富贵”。有的在敌斗争中不战而降；有的为虎作伥，引敌深入。等到兵临城下，石重贵只落得站在京城的封丘门外，恭恭敬敬地和太后一起亲自迎降。堂堂后晋皇帝，竟然做了阶下之囚。

入城的时候，首先是汉奸张彦泽军到处搜劫，使京城为之一空。跟着侵略者又纵兵四掠，括借官民钱帛，无论贫富，概无幸免，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饱受流离的痛苦。赵匡胤家庭挨过这场风波，自然也是狼狈不堪。加上家庭人口不断有了增添，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添了三弟匡义，刘知远建立后汉那年（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又添了四弟光美。父亲虽然久典禁兵，但是二十多年来没曾升迁过，也是郁郁不得志的。一个年方二十一岁的青年，正当朝气蓬勃，更兼学会一身本领，未来憧憬的追求和家境的变迁，驱使他在汉初以后几年，离开自己的家庭，过着“四